

蒋 介 石

严如平

—

蒋介石,谱名瑞元,字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8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①抚育成人。王采玉笃信佛教,对子管教甚严。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5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②他爱好玩弄刀棒,常常聚集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喜欢自封为大将登台指挥。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他因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③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他在东京结识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蒋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

年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在日本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旋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他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蒋一切惟陈其美马首是瞻，曾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于1912年1月14日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④案发后蒋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鼓吹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年底回国。

25岁的蒋介石，血气方刚，自结拜陈其美后，更是亦步亦趋，追随陈其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受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派，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党人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闲时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述。1914年春他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攻夺官署和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取得攀附。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于1918年春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曾拟“援闽”作战计划。“援闽”之役，蒋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

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曾向孙中山要求出国留学，未获同意，意志消沉。1920 年他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投机生意，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期间他结识了虞洽卿、杜月笙等人。

1922 年 1 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参与拟订北伐作战计划。蒋建议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未被孙中山采纳，遂于 4 月返上海。6 月 16 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避往永丰舰与叛军相持，18 日电蒋“盼速来”。^⑤蒋于 29 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直至 8 月 10 日护送孙离粤返沪，并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称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⑥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 月，孙中山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组织为“东路讨贼军”征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到职后，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⑦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 年 2 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但蒋此时心绪纷乱，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⑧直至 4 月 20 日始抵广州。8 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访问了苏联党政负责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考察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后的建设，参观了工厂、农村和苏维埃组织，并着重了解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以及红军的政治工作等，历时 3 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

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别有用心，是没有诚意的。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总之，苏联之行反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疑虑和偏见。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为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造就骨干力量。蒋介石被派为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嫌办军校没有军政实权，提出辞呈擅自离粤去沪，谓“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⑧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一再劝导和催促下，他4月下旬回粤，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时，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培训骨干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对军校工作抓得很紧。他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讲，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⑨同时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为军事教官，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为政治教官，刘峙、陈诚、钱大钧、顾祝同等为队长。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他的嫡系亲信，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后，把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他于当年10月率领军校师生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1925年2月指挥黄埔军校教导团参

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 6 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保卫南方政权。

是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 7 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等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 月 20 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兼任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在查办廖案中，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逐往上海，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 10 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而他的权力欲也逐渐上升。他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进一步攫取权力、建立个人统治的阻碍。他在军校支持一批师生组建“孙文主义学会”，以牵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师生组建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虽然表面上也谴责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反革命”，^①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步西山会议派之后尘，要求校内的共产党活动应公开，规定国民党员要加入共产党者须向党部声明并请准等，是为蒋介石限共、防共之滥觞。

1926 年 1 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随着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为了进一步夺取军政大权，

他处心积虑地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3月20日，他捏造事实，诬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枝，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于事件后借口生病就医而隐匿不出，蒋乘机取代汪担任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他意识到自己羽毛未丰，还必须依靠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就采取两面手法：在联合共产党的同时，又设法限制共产党。在5月15日开始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提出了《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充任中央党部的部长。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切训令，应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一系列限共防共措施。蒋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他的结拜兄弟张静江被举为中央常委会主席。一个月后，蒋又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在蒋介石的竭力主张下，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8个军约10万人。北伐战争的战略是先以主力攻击占据湘、鄂、豫等地的吴佩孚，再及苏、浙、赣、闽、皖的孙传芳和北方的张作霖。蒋介石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为主力，先期进入湖南，配合唐生智第八军北进。在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蒋在长沙召集军

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经过 4 天苦战，29 日攻克吴佩孚重兵据守的汀泗桥，继夺贺胜桥，乘胜追击，于 9 月初进抵武汉近郊，6 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军主力被歼，残部死守武昌城负隅顽抗。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 月 17 日他离鄂赴赣，直接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 3 日未克，牺牲甚大，被迫下令撤退，重新部署。这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八军于 10 月 10 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军入赣助战。11 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 日占领九江，8 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力图把党政军控制于一手，先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想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而拒不执行迁都武汉的决定。12 月 13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但蒋介石仍然截留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 1927 年 1 月 3 日擅自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作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被否决，但他持抵抗态度，拒不出席 3 月 10 日至 17 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度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这时，占领湘、鄂、赣、闽的北伐军乘胜向浙、皖、苏推进，攻取浙江的东路军进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阶级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3 月 21 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解放了上海。与此同时，北伐军 24 日占领南京。

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他们对拥有军事实力而又反共的蒋介石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蒋介石也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以期取得支持。此时，他发动了一连串暴行：3 月 6 日密令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 日强制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 日唆使暴徒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 日又派人捣毁安徽临时省党部和总工会等。对于 3 月 24 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因而上海《字林西报》3 月 28 日认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蒋在会见虞洽卿和江浙财团代表时又表示：“本人亦抱维持资本家主张”；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⑨，从而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立即从他们那里得到 1500 万元经费，还获得保证将再得到 3000 万元作为建立政权的资本。同时，“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纠集流氓打手，准备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人力。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3月29日，他下令取消上海人民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2日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蒋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李宗仁、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商讨“反共清党”问题。他采用两面手法，麻痹工人群众。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则假惺惺地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⑬4月6日，他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他又下令查封北伐军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另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总揽上海军政大权。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上海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以调解“工人内江”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自己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党政军大权。他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而实际上“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⑭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改变“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

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⑮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力图收复。不料旬日之间，一败涂地，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⑯蒋介石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⑰被迫于8月13日辞总司令职，宣布下野。

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了一个多月，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蒋追求宋美龄有年，因他早有妻妾，^⑱宋母一直未同意。这次他向宋母表示，他已与妻妾离异。宋母要求他加入基督教，他答应先研究教义。^⑲1927年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从此，他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并通过他们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后来成为亲美派的首脑。

蒋介石离职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仍然纷争不息，以汪精卫为首的粤系与李宗仁的桂系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沪系之间，争夺十分激烈，而谁也不能控制政局。蒋介石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利用这个矛盾，纵横捭阖，并得到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

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正式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四派联合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寻衅，制造了震惊一时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部属“忍辱负重”，将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6月初，北伐军队分三路向京津推进，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②。

二

蒋介石完全掌握了统治全国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宣称要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但是，各个地方实力派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要想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首先要削弱、消灭其他各派的军事力量。1929年1月，他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声称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1.1万人），想要利用改编来装备和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将各派军事首领委予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蒋介石以“统一”相号召，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封官许愿、收买拉拢、分化瓦解、重兵进攻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然而，蒋介石和各地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

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1930 年终于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蒋调集数十万兵力抗衡,设行营于徐州,亲自坐镇指挥。他还凭借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之间的矛盾,施展了分化瓦解的策略。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活跃起来,利用阎、冯的军事力量联合倒蒋,于 8 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 月 18 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各派大势已去,“扩大会议”无疾而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

蒋介石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后,即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军事“围剿”。他自恃握有重兵,妄图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亟,民族危机严重,蒋仍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作心腹之患,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从 1930 年 12 月至 1934 年 10 月,连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两次自任总司令,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向江西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洪湖根据地发动进攻。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第五次“围剿”时,他调集 100 万兵力、200 架飞机,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用层层筑堡、逐步缩小包围地区的办法,向前推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左”倾路线的错误,经过一年的战斗,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量屠杀革命群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

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蒋介石在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想采用自己当总统以便高度集权于一身的办法来加强控制。在 1930 年 11 月 12 日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反对和抨击。蒋十分恼怒，于 1931 年 2 月 28 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蒋胡两派骤然尖锐对立。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 5 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害怕事态扩大，实行不抵抗主义，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 12 月 15 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实际上，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仍然控制着党政军大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 1933 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蒋介石为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力谋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在外交和内政上采取一些措施。他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了币制。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他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收入不敷支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竭力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独占的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利用政治权势和通货膨胀等手段，大量聚集财富，逐渐垄断了全国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

为了强化统治，蒋介石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送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还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两个特务系统：一个是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扩为处）是它的活动阵地；一个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特务系统，“复兴社”特务处是它的活动阵地。这两个组织于1938年8月分别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他们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并防范国民党

内的反蒋派系，翦除异己力量。

蒋介石还在全国发动文化“围剿”，以加强其思想统治。

1930年9月他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鼓吹以恢复中国封建传统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介石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一再妥协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相反，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有增无减，1935年10月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外交方针演讲时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④表明他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

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为了防范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蒋介石在此前后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采取准备抗战的某些措施，如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化古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作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了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北平、上海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关系，试图收编工农红军、取消根据地政府。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蒋严加申斥。张、杨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捉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极为恐惧，以死相抵，立下遗嘱。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六项协议，声称愿以人格担保，但为顾全体面不

肯在协议上签字；他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②25} 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但是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然而，迫于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形势，蒋介石不敢公然撕毁协议。1937年1月5日他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他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调整国共关系问题，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有所转变，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为解决国共两党合作中的各种问题，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马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

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焰也不敢再作退让，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指挥，“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②密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两个师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一师及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开往石家庄；决定在石家庄设立行营，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并电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